

我这一辈子得到过许多老师的教诲,这些先生在我的人生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影响了我的一生。

小学时光

20世纪60年代我所就读的安庆市双莲寺小学,是一所有着历史积淀的老学校,当时汇聚了一批相当出色的教师。

梁浩如先生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当时的他,已然中年,高高的个头,稀疏的头发,不苟言笑,人却很平和。我至今能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教了我多少知识,而仅仅是一件小事,一件足以改变我世界观的小事。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庭,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幺。按理说,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我的家庭还算是较为富裕的家庭。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童年以及少年时代,一年四季,我几乎都是接手哥哥姐姐的旧衣。最为夸张的是,我不止一次穿过姐姐们淘下来的花衣,这让一个极为自尊的小男孩很自卑。上一节是体育课,我们满操场地奔跑,汗流浹背,一进教室,我便脱下外衣,我忘了,我身上穿的是一件姐姐绿底碎花小棉袄改的花背心,瞬时,我成了课堂里一个笑点,同学们笑成一团。正在这时,梁先生走进了课堂,左臂夹着一把直尺,右手拿着粉笔盒。他看着欢闹的课堂,大为不解。得知原因后,梁老师瞬间板下了脸,他说:这有什么值得你们笑,穿花衣有什么错,我也穿花衣,说着,先生掀起了他的外衣,露出了一件红毛衣。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学生要比的是学习成绩,那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吃穿。课堂瞬间就静了下来,那些笑得很欢的同学低下了头,而我则挺直了腰板,抬起了头。先生用他的爱心,保护了稚童那颗易碎的玻璃心,给了这个孩子体面和尊严。从那以后,我便更加努力地学习,我知道只能追求自己能改变的东西,也再没有为“花背心”而自卑。

钟梅英老师是我四年级时的语文教师。后来我爱好文学,喜爱读书,得益于她。钟老师中等个头,说话轻言慢语,她的语文课很有活气,学生们都很喜欢。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从小爱读书,平时省下的一点早点钱,基本送给了路边的小人书摊。那时的小学,办学条件有限,但双莲寺小学却有一个仅对教师开放的图书室,我常常趴在图书室的玻璃门外,眼巴巴地瞅着里面五颜六色的书。一次偶然的机会,钟老师来图书室时看到了趴在门外的我,便和颜悦色地问我,是不是想看书,我忙不急地点头称是。钟老师告诉我,她



我的老师们

吴功华



渔者 余伟 摄

可以借书给我看,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每次还书时要上交读书笔记,将书中优美的句段摘录下来,还要和同学分享。我连忙答应了。从那以后,我便有了阅读课外书籍的机会,也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这一习惯陪伴了我的一生,让我受益终身。

学画路上

1966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结束了我的快乐读书生涯。

1970年我初中毕业,因为所谓的家庭问题未能升学、招工。为了养活自己,我开始学木匠,但因为身体过于单薄,无成。我又试图学画画,这是需要老师指导的。我便遇到了我学画路上的三位先生。

启蒙老师黄启福——此时他在安徽省黄梅戏学校担任美术教员。通过亲友介绍,1973年,黄老师利用回潜山探亲的机会专程来安庆见我。黄老师个头不高,身材较为单薄,十分儒雅,很有亲和力。他对我的处境十分关切,对我的求学愿望鼓励有加。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素描便是在他潜山家中完成的。他手把手地教,如何执笔,如何观察,如何画线,不厌其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给我来信指导,还给我寄来了他创作的版画。

方之虎先生是我的第二位老师——时任安庆市黄梅戏剧团美工。方先生桐城人,个头不高,身材单薄,为人谦恭和善。我的学画地点是在他单位的宿舍里,他的家仅一间房,家具不多,但却十分整洁。每次去他家,摆完静物,交代完注意事项,他便去单位上班,将家交给我这样一个以前并无交往,仅凭同事介绍的小年轻,足见他的善良和忠厚。他知道我的家境,便常常给我提供画素描的纸张和铅笔。若干年后,我曾经在上班途中的公交车上看到过他,时值上班高峰,车厢似沙丁鱼罐头,我在后门,他在前门上了车,我极想和他打声招呼,诉说一下我的近况,但苦于人群阻隔,无法近身。我以为来日方

长,后会有期,谁知这竟是最后一面。不久后,我偶然得知,在一次剧团下乡演出拆装台时,方先生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我当时如五雷轰顶,呆呆地站在那里。是的,很多时候,来日并不方长。

我的第三位老师是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鲁开疆先生,当时在一家大型印刷厂担任产品设计工作,因为学习色彩的需要,我便拜他为师。鲁老师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那饱满的前额,他个头不高,为人和善,谦和有礼。他有两个孩子,当时都还年幼,需要照料。他夫人是小学教师,平时工作也很忙。他总是利用下班忙完家务后来我家给我指导。每次总是匆匆赶来,指导完后便又匆匆离去,毫无怨言。其时我已经招工进了一家区办工厂做车工,三班倒,繁重的体力活让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情绪较为低沉。鲁老师看在眼里,每每指导之余,便抽空跟我聊天,排解我的困惑。

尽管后来美术并未成为自己的专业,但那段学习绘画的经历已成为我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的大学

1978年,我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我的四年求学生涯。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人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校园里求学风气极盛,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图书馆总是一位难求。大家都希望抓住难得的机会,把多年的损失补回来。大学期间,我喜欢上了唐诗宋词,并选定了唐宋文学为我的主攻方向,大四那年,我报考了本校的唐宋文学研究生,从而有幸认识了导师之一的余恕诚先生。

余恕诚先生当时给77级中文的同学上唐代文学课,口碑极佳。我是通过一位老乡的介绍去拜见余先生的。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他家,当时我十分紧张,但余先生态度和蔼,细语轻言,很快让我放松下来。他仔

细地询问了我的学习经历和我考研的前期准备,并看了我带去的大三时为学校大学生论坛写的关于现代诗探讨的论文《朦胧诗之我见》一文,对我鼓励有加。一次,当余先生得知我正为要完成毕业论文而耽误考研复习烦恼时,当即告诉我,将这篇文章稍作修改交上去就可以了,无需另起炉灶花费时间。当考研成绩出来后,我因专业课和外语两科未能过线而名落孙山。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一所郊区中学教书,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再加上我还没有走出失败的阴影,觉得愧对先生,便没有主动和先生联系。可刚到学校不久,便接到了余先生的来信,我感到十分诧异。展开信笺,余先生娟秀的字迹展现眼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手书。他关注我的处境,勉励我继续读书,短短的几行字,情真意切。他是通过别的同学知道我的通信地址的。读完短信,我潸然泪下。先生平时教学、科研任务那么忙,弟子那么多,却还挂心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学生,这种胸怀和情谊,让我感动不已。如果再不努力读书,有所作为,将愧对先生。自那以后,无论面对困境还是顺境,我始终坚持读书,使之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2013年,当我倾尽二十余年之力的地方文化研究专著《桐城地域文化研究》出版后,我专门请同学将书转呈给先生,让他能够放下心来。

严云绶先生是大二时文艺理论课的授课教师。第一次听先生讲课,那浓浓的桐城方言让我这个故乡人倍感亲切。彼时先生正值壮年,风度翩翩,博学儒雅。

再次见到先生,是在离开学校回到故乡的二十多年后。彼时严先生回故乡桐城探访,我得以全程陪同。先生对故乡饱含深情,对桐城人物掌故如数家珍。其时我关注研究桐城文化近二十年,想写一本全面介绍桐城文化的专著。当严先生得知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告诉我,桐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传统地方文化的标本价值,很值得研究,并从宏观到微观进行了具体指导。2012年,我终于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初稿《桐城地域文化说》,我请鹏生同学转送给了严先生,请他审读把关,并请先生写序。一个多月后初稿寄了回来,从头至尾,凡是需要修改的地方,先生都用红笔一一作了标注,有的直接做了修改。先生还建议将书名改为《桐城地域文化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先生正在病中。先生撰写的《序》,充分肯定了《桐城地域文化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并高屋建瓴地进行了提炼和梳理。2013年,此书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严先生的推介,此书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学术界和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和好评,并于2015年获得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学术著作二等奖。

而今我也已进入古稀之年,我的恩师们,也大多已经作古。当年面对他们时,我没能说声“谢谢”,或因无知,或为腼腆,或是错过。如山的师恩,常常让我难以承受。抚今思昔,感慨良多,教师节前,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既是追思,感恩,也是纪念、反思,尤其是在“师道之不存久矣”的当下!